

外国戏剧 经典文化诗学阐释

Waiguo xiju jingdian Wenhua Shixue Chanshi

孟昭毅 著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究丛书

孟昭毅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戏剧

经典文化诗学阐释

Waiguo xiju Jingdian Wenhua Shixue Chanshi

孟昭毅 著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研究丛书

孟昭毅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戏剧经典文化诗学阐释/孟昭毅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61-0411-8

I. ①社… II. ①孟… III. ①戏剧研究—国外 IV. ①I1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9946 号

责任编辑 储诚喜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1（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 - 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王延文

副主任：孟昭毅 杜 勇

委 员：（按姓名拼音顺序）

甘丽娟 郝 岚 吕 超 黎跃进

赵利民 曾思艺 曾艳兵

序

乐黛云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保护文化生态，发扬各民族文化特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正如著名学者恩伯特·埃柯最近在欧洲高层论坛上的发言“裂缝、熔炉，一种新的游戏”中所提出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不会像在熔炉中一样，变成同一的“合金”，必须保护原有的文化生态，保持各自的文化基因，即原有的根本不同特点，形成不能复合，不相覆盖的“裂缝”，才能在比较中互为“他者”，促进发展。因此，恩伯特·埃柯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对多元文化理解能力的培养应当在国家的政治议程上占据重要位置，特别是教育应该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多样性的“对视”之上，他坚持的是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在未来要承担的必不可缺的任务。

即将出版的“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在上述语境中可说是开风气之先，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丛书第一辑将出版5本，其中吕超的《比较文学新视域：城市异托邦》在福柯新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大大拓展了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的视野。所谓“异托邦”大体是指在不同空间的边缘处或交叉处，会产生不同于原有空间的新的多变的不确定的空间，研究和言说这种新的空间，必须有特殊的方式方法，并将因此获得新的哲学构思和新的哲学能力。吕超以英语长篇小说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不同时期的不同描写所构成的张力为例，从精神气质、城市空间和城市人三个方面剖析了老上海和老北京两个异域空间的相异、交叉和重叠，很能发人深思。

孟昭毅等的《20世纪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除对过去研究较多的

日、韩、蒙古、朝鲜、越南等国文学进行了新的解读外，对过去接触较少的泰国、缅甸、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家的文学都有所分析；特别是辟专章讨论了南亚和西亚、北非各国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前者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文学的关系；后者包含了埃及、波斯、土耳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文学状况，多是发前人所未发，带来了过去人们较少关注，但对文化多元发展十分重要的新知识。

如果说孟昭毅等的《20 世纪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是对当前东方文学现状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作了相当全面的“散点”研究，那么，黎跃进的《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则是将 150 年来的东方文学作为一个地区性整体，进行了纵向的区域性历史研究，特别是对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源流、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形成、启蒙思潮的影响以及当代后殖民主义的展现都作了详尽的探讨。这种“区域史”的探讨不仅是研究“已成事实”，而且是把重点放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形成的种种新的空间的交叉上，通过“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人物之间的交往和物质文化的交流等，进行动态的研究，为后来者提供了新的思考平台。

另外，曾艳兵的《价值重估：西方文学经典》对一些重要的西方文学名著进行了新的现代诠释；曾思艺的《俄苏文学及翻译研究》对俄苏的诗歌、小说、文学翻译也有新的论述，都能收开卷有益之功，值得一读。

丛书第二辑列入出版计划的是赵利民的《对话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郝岚的《世界文学与 20 世纪天津》、甘丽娟的《纪伯伦在中国》、黎跃进的《多重对话：比较文学专题研究》和孟昭毅的《外国戏剧经典文化诗学阐释》。这些著作也是各位作者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新成果，相信这批成果对文化的多元对话和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将产生促进作用，大家拭目以待吧。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2011 年 3 月 16 日

前 言

“比较文学”就名称而言是舶来品，它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国学术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学界勃发、成长。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学术大潮中，我校的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也如鱼得水般地发展起来。

最初我校是在恢复高考后的七七级、七八级中文系学生中开设了与比较文学相关的课程。自 1982 年开始，在收集、学习和研究当时所能得到的各种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中文系开始编写《比较文学概论》讲义，并于 1983 年初完成初稿。与此同时，中文系也正式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这是针对大学四年级学生开设的选修课，课时为一学期。自此以后，相继开设了“比较文学概论”、“比较诗学”等比较文学课程。1983 年 6 月，我校与南开大学等单位联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从此拉开了中国比较文学腾飞的序幕。这次与会的近百余名专家学者不仅讨论了比较文学的一般原理，而且提出了“中外文学关系”、“东方比较文学”和“中国学派”等亟待深入探讨解决的问题。通过一系列学术活动，我校的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

经过中文系相关教师多年的艰苦努力和各级领导的支持与关心，在季羨林先生和乐黛云先生的积极支持下，我校的比较文学学科在 1993 年国务院第五批学位点申报工作中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全国最早独立申报并获批的比较文学硕士点之一（部分院校原有外国文学硕士点，当时这两个学科尚未合并）。“九五”期间，比较文学成为学校重点学科并

获得了稳定快速的发展,培养了不少优秀的毕业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和论文,获得了不少省部级奖励和科研项目。这些比较文学的研究实绩,使学科在不事声张、实事求是、刻苦钻研的学风中茁壮成长。“十五”期间再次成为我校重点学科的比较文学,再接再厉,在领导的关怀和帮助下,引进了赵利民、曾艳兵、曾思艺、黎跃进等中青年学者,形成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和中日文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三个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在国内比较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随之在2003年国务院第九批学位点申报时,我校独立申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成功获批。

2006年,我校比较文学学科获批天津市重点学科,以该二级学科为基础,2009年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申报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申请获得批准,2011年初我校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也通过审批。“十一五”期间该学科12名教授中已有6位博士生导师,并特聘美国讲座教授一名;国家级精品课一门、天津市精品课两门,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教材20余部,其中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4部。现有省部级在研项目20余项,其中国家级科研项目8项。2010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获得天津市优秀教学团队。比较文学现在已经成为我校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又一支生力军。

该学科独力承办过多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与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越南、土耳其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和澳门地区的多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扩大了国内外的学术影响。

该学科多年来培养的数百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遍布祖国各地。他们中的一部分除在天津市各高校工作外,有的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广州大学、青岛海洋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成为教授、硕博士生导师和学术骨干。部分优秀硕士研究生分别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此外学科还培养了一批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哈萨克斯坦、波兰、我国台湾和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硕士、博士生,在国内外赢得了

良好的学术声誉。

为了集中展示我们近年来的科研成果，学校支持和鼓励我们编辑出版“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丛书共10本，分两辑出版。第一辑5本分别为孟昭毅等的《20世纪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曾艳兵的《价值重估：西方文学经典》、曾思艺的《俄苏文学及翻译研究》、黎跃进的《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和吕超的《比较文学新视域：城市异托邦》。

《20世纪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全面梳理和分析了中国文学与其他东方国家文学之间相互影响、互涵互动的关系，对于确立中国文学本位意识、构筑东方文学统一性、参与世界文学对话，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著作既有对贯穿整个20世纪的纵向梳理，又有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整个东方范围的横向比较剖析；既有立足于中国文学与东方文学关系的宏观立论，又有针对文学流派、作家作品间相互影响的微观探析。

《价值重估：西方文学经典》立足于中国立场和比较文学的视野，对西方文学的部分经典之作做出新的阐释。作者从变态心理分析角度阅读和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新的体验和收获；从现代性、后现代性等角度打量和思考西方传统文学经典，对古老的文学经典有新的认识和发现；对近年来似乎已经说尽，但其实不然的卡夫卡话题加以新的审视，获得谛听卡夫卡的新方式。作者的研究表明：所有的西方文学经典，之所以是“西方”经典，皆因为我们站在东方土地上言说，重评西方文学经典，既是重评“西方”，也是重评“我们”。

《俄苏文学及翻译研究》是作者多年来在俄苏文学翻译方面科研、教学心血的结晶，其主体部分对俄苏诗歌和小说进行研究，对俄国中古著名史诗和一些重要诗人及其创作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肖洛霍夫等人的小说内涵和风格做出了全新的阐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俄苏文学翻译，做出全面而简要的概述，并对一些成就突出、很有特色的翻译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评析，具有理论思考的独到性和资料的丰富性。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在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化全球扩散、东方社会做出回应的背景下，探讨150余年间在亚非地区盛行

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对这一文学思潮的文学渊源和纵向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将东方启蒙文学当作民族主义文学的早期形态，以 20 世纪初期至 60 年代东方的民族主义文学为思潮发展最为成熟、典型的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至世纪末的后殖民主义文学视为思潮的延伸形态，这样把整个东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视野开阔，并有理论的创新。

《比较文学新视域：城市异托邦》开拓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域，该书创造性应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概念，整合比较文学形象学、城市文化、后殖民等理论，将研究对象聚焦到文学中的异域城市个案形象，重点论述城市异托邦的理论谱系、生成机制和研究范畴；以西方文学（特别是英语长篇小说）中的老北京和老上海形象作为案例剖析，重点分析它们分别体现的城市异托邦的两副典型面孔。

第二辑 5 本分别为赵利民的《对话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郝岚的《世界文学与 20 世纪天津》、甘丽娟的《纪伯伦在中国》、黎跃进的《多重对话：比较文学专题研究》和孟昭毅的《外国戏剧经典文化阐释》。

《对话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对古代中国文学在欧洲主要国家和东方诸国的传播与影响给予比较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同时还注意文学交流中的个案研究。对处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相互交融过程中的中国近代文学及其观念做出了颇有创新性的研究，是该学术领域的一项新收获。

《世界文学与 20 世纪天津》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视角出发，系统总结了 20 世纪天津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包括以近代天津文化名人、当代天津小说家与世界文学、天津翻译家与翻译活动、天津在西方戏剧进入中国进程中充当的角色等内容，将地域学术活动对世界文学的传播接受纳入研究视野加以讨论，富于创新意识。

《纪伯伦在中国》全面考察纪伯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等情况，梳理纪伯伦作品中国之行的主要脉络，展示纪伯伦及其《先知》如何在中国被确立为经典的事实，进一步分析纪伯伦在中国的多重影响，对纪伯伦创作与生活的多元文化背景进行解读，为纪伯伦研究的更加深入奠定扎实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多重对话：比较文学专题研究》立足于多元对话的文化立场，对中外文学大量彼此交流互动的文学现象进行清理和研究；对中外文学史上具有价值联系的类同现象做出平行的考察和分析；对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加以审美层面的深层思考，得出具有启发性的认识和结论。著作中对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关系的探讨，显示出理论前沿的色彩。

《外国戏剧经典文化诗学阐释》对东西方主要戏剧文本进行文化和诗学两个层面的解读，得出学理上的一些规律，是作者继《东方戏剧美学》和《印象：东方戏剧叙事》之后又一部戏剧文化的力作。

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是该学科教师近年学术科研的总结，更是该学科“十一五”期间学科发展的一次检阅。其中包括3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两个省部级项目，3篇博士学位论文。其中虽然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们是每位作者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他们的研究特色和专长。随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我们的学术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展开，丛书出版也还将继续。我们也愿意将此奉献给广大读者，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分享学术研究带来的快乐。

回顾我校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30年来，伴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脚步，涌动于解放思想的时代潮流，在天津市和学校各级领导的关怀与帮助下，在文学院全体教师的支持与努力下，在全院学生的理解与欢迎中，从零起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筚路蓝缕，艰辛异常，走出一条顽强拼搏、努力奋斗的科学发展之路。作为整个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反映了祖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而贯穿其中的正是勇气、前瞻和向历史交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虽然在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方面，与兄弟院校相比，我们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我们相信，天津师范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在不远的将来，和全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事业一样，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不辜负所有关心它、支持它成长的朋友们的期望。

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1年3月18日

目 录

导论 文化诗学：“经典”研究的新视阈	(1)
第一章 西方篇	(6)
第一节 走出希腊走进中国的戏剧	(6)
第二节 古希腊悲剧的艺术魅力	(9)
第三节 埃斯库罗斯与《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23)
第四节 索福克勒斯创作简论	(29)
第五节 《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的“英雄”	(40)
第六节 《安提戈涅》：不幸的儿女	(49)
第七节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比较	(57)
第八节 《哈姆莱特》：过早凋零的娇花	(60)
第九节 《钦差大臣》：沙俄官场现形记	(63)
第十节 《玩偶之家》：妇女解放宣言书	(66)
第二章 东方篇	(70)
第一节 东方戏剧美学：诱人的世界	(70)
第二节 东方戏剧叙事学：陌生的时空	(76)
第三节 朝鲜绝唱《春香传》的叙事传统	(84)
第四节 日本能乐的叙事内涵	(89)
第五节 日本歌舞伎的叙事分析	(98)
第六节 越南戏剧的叙事特征	(106)

第七节 泰国孔剧的叙事功能·····	(115)
第八节 缅甸戏剧与《卖水郎》的叙事·····	(122)
第九节 卡塔卡利舞的叙事诉求·····	(131)
第十节 《沙恭达罗》的抒情性叙事·····	(140)
第十一节 泰戈尔象征剧的叙事美·····	(143)
第三章 比较篇 ·····	(155)
第一节 面具文化与戏剧美学·····	(155)
第二节 玛卡梅:从艺术到文学·····	(171)
第三节 “场”“张力”与观众接受·····	(183)
第四节 曹禺对古希腊戏剧的借鉴·····	(189)
第五节 “杜兰铎”的影响与接受·····	(193)
第六节 中印古典戏剧叙事对话·····	(204)
第七节 朝鲜戏剧艺术与中国文化·····	(219)
第八节 《长生殿》《沙恭达罗》异同论·····	(226)
第九节 《桃花扇》和《熙德》的悲剧美·····	(232)
第十节 《沙恭达罗》《暴风雨》的审美比较·····	(242)
第十一节 《中国孤儿》对《赵氏孤儿》的再创作·····	(250)
第十二节 印象图兰朵:从文本到戏剧·····	(259)
后记 ·····	(268)

导 论

文化诗学：“经典”研究的新视阈

一

戏剧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学艺术形态。

初民时期的人类，在生产水平十分低下，智力极端不发达的情况下，慑于自然界的威力总想亲炙自然，取悦超自然力，于是有人就有了一些先知先觉的举动，想在人和自然之间进行某种形式的沟通。这些智力相对聪慧的人开始扮演超脱人类，但又融不进自然力的“居间者”。这些“居间者”必须异于人类，又不能混同于自然力的化身，成了想象出来的“自我”，仿佛成了两者之间的“使者”。因他（她）们的身份特殊，但又生活于人类之间，因此，在行使“使者”职能时，要借助简陋的化装进入状态，于是表演艺术的最初元素即“装扮性”开始产生了。而他（她）们的行为举止也必须不同于凡人，于是，无规则的手舞足蹈便有了表演艺术的另一元素即“观赏性”。初民时期的这种本能与需要开始从娱神的表现发展为娱人的表演。但它显然离戏剧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的出现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相对而言，戏剧形成较为完善的文艺形态比较晚。在它产生之前，人类已经创造了舞蹈、歌谣、音乐、神话、故事、诗歌、史诗、绘画、雕刻等多种文艺样式。正是在这些文艺形态的基础上，一个杂糅了各种艺术元素的综合性文艺样式——戏剧，以其似曾相识的博大宏深，进入了人类的审美视野。就此而论，戏剧不是创造的陌生文艺形态，而是应运而生的熟悉面孔。因此可以说，先于它产生的各种艺术门类反映了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的各种物质和精神需求，而戏剧这种综合文艺形式的生成，反映的则正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的审美领域里，需要某种体验的文

化心理。因为戏剧从不同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人类的生活，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所以，一旦人们走进戏剧，就再难以自拔，他们看到了被装扮的“自我”。

如果说戏剧这种文艺形式，因为社会需求而蔚然勃兴，因为人类审美而赏心悦目的话，那么，“外国戏剧”这一名称即是表明它的相对性和学理立场，显然它是以中国为中心、为参照系，而且观照的是不包括中国戏剧在内的外国戏剧的多个侧面。外国戏剧包括了当下流行语“东方”和“西方”的种种戏剧形式，它们上下数千年，纵横数十国的内容；浩如烟海、灿烂辉煌的成就，为广大读者和观众提供了一个非常明快、舒适的阅读和欣赏空间。中国传统的戏剧，古代主要是载歌载舞的戏曲，“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有了话剧，而外国戏剧从古希腊戏剧、印度的梵剧、日本的能剧；到英国的歌剧、法国的古典主义戏剧、印度的舞剧、日本的歌舞伎；以及近现代东西方各国的种类繁多、名称各异的戏剧形式等，无不表明东西方各国各族人民对戏剧的理解，以及运用这种艺术形式所表达的自我与社会、与自然、与他人之间的复杂多样的关系。认识这些对中国的读者和观众来说是很必要的。否则中国的读者或观众，在异质文化背景下，阅读与欣赏外国戏剧，确实总会有隔靴搔痒、雾里看花的感觉。

二

外国戏剧这种文艺形态，包括剧本、理论、舞台、编导、演员、表演、服饰、舞美以及灯光等诸多方面。既有大量的实践，又有大量的理论。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剧本和理论，正是因为有了文本说和戏剧美学才使得外国戏剧有了“经典”之说，即“外国戏剧经典”。这里所说的“经典”是指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文学样式，其中那些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量、读者和观众都承认是最有意义和价值，并且同时具有深刻思想性和广泛文化内涵的优秀作品。它们是历史文化的积淀物，是人类精神产品的结晶，具有持久性、典范性和权威性。

其实，作为本体论意义的“经典”，在中外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意义不尽相同。在中国古代，“经”和“典”是两个字，各代表不同的含

义，后联合使用时，逐渐特指那些典范性的儒学经书。后来，“经典”的范围也扩大到了宗教的经籍，即涵盖了儒释道的重要典籍。于是“经典”特指那些承载了道理与训诫的各种典籍。具体到文学而言，经典就是承载文学“至道”和“鸿论”的典籍。而外国戏剧经典，则指那些传播戏剧本质、警世人生、认知社会的外国戏剧中的经典作品，它们历读不尽、历演不衰，为人类提供了极大的人生经验和感受，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外国戏剧经典具有极高的哲理性和丰厚的文化性。哲理性是一部经典文本必须具备的从理性出发对人生、生命、生存状态、理念、思想等一系列带有很强思辨性和很深哲学性问题的深邃探索。文化性即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中的那些带有文化本体的特征，是人们认识文化现象时必不可少的一种立场和观点。外国戏剧经典是内存巨大的信息资源库，用哲理和文化这两种利器能够深掘出裹藏在经典文本内核中的精髓，即经典辉煌永存的价值所在。只有如此经典才是名副其实的，才会历久弥新。

外国戏剧经典还具有鲜明的时间性和独特的审美性。时间性是经典的标志，是时代的缩影，是人生的瞬间存留在历史长河中的片片水花，它可以永远被历代的读者和观赏者感受到如身临其境般的戏剧效果。因此经典文本不是古董不是赝品，而是随时代变化的精品，人们可以不断地发掘出那些潜藏其中的美学价值。审美性即是通过作者、读者对经典文本美学意义的预设与发现，对经典的美学内涵、审美标准有了全新的理解。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审美，人们不仅把握到其美学的基本特征，即不仅让人从现实功利中超脱出来，走向一种心灵净化之美，而且要将丰富多彩的戏剧文本与美学对接起来，以开辟新境，结出异果。外国戏剧经典蕴藏着巨大的美学资源，只有依靠时间和审美这两把卡尺来衡量，才能发现经典文本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三

文化诗学吸收了文化研究的特质，具有关照当代性的文学特征，这种舶来品的学理旨趣在于强调文学和艺术与其他社会实践之间的整体联系，是在一种复杂结合与相互关联中形成的总体文化观念。这一批评原

则要求在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去综合考虑影响一个作家创作的多元化因素，诸如从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等跨越文学学科的诸文化大视野里来考察一切文学和艺术问题。它以关注作家创作的初始文化背景，来审视作家作品的文学文本意义和价值，尤其是文学的各种深度模式，从而在本质上将作家的文本研究真正推进到文学的深层，并透过文本最大限度地发掘出作家的思想观点和创作原则。文化诗学的意义在于追求文学的现代性，并使之具有诗学内涵。

外国戏剧经典文化诗学阐释，就是要从文化诗学的视角对外国戏剧经典进行解读和阐释，要理解经典文本背后文化诗学的意义。因为正如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经典文本的正确阐释离不了当代性，尽管这其中存在某些误读甚至是曲解，但是人们对经典文本的阐释就是要尽量从经典文本的字里行间，去仔细品味作者的生命述说，深刻体察作者的人生感悟，理解作者之所以如此创作的种种苦衷和设限，达成读者抑或是评论者与作家心灵之间真诚、平等的对话；形成阅读、评论与文本叙述之间求真、逐美的绵密交流。唯有如此，外国戏剧经典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诗学阐释。

毫不夸张地说，外国戏剧经典文本是作家生命意识的思想结晶，是作家精神世界的情感体验，他们在深度思考人生、严肃拷问生命的基础上，用作品言说了自我。正因为如此，真正的戏剧经典文本必然会为未来的理论批评和解读内设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凡经典文本不仅要经受这些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还要经受读者和批评者的“恶评”。但是在我们用文化诗学的理论去重读这些经典文本时，始终要信守一个准则：即一切批评、评判的过程，都必须遵循言说“文本”，或者“文本”言说的原则，努力使自己的观点以事实为依据，结论有情节作支撑，批评只能是对经典文本的思想概括与归纳，而不能是超越文本的自我发挥，绝不能让经典文本成为“自我言说”的论据和材料。

无疑的是，外国戏剧经典文化诗学阐释的过程，难以避免出现误读。有人认为误读就是创造，为了创造而误读就是曲解，那一定会脱离经典文本，违背文本阐释的初衷。尽管我们对外国戏剧经典的阐释难免会有中国立场，但是还是要尽量设身处地思考文本。以文化诗学的视角